

中国历史文化

悬案总览



尤 原 倪天礼 耿刘同 主 编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下

中国历史文化悬案总览

(下 册)

沈 原 倪天礼 耿刘同 主编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• 北 京 •

四 著述归属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神农写的吗

《神农本草经》，简称《本经》或《本草经》，是我国古代四大医学宝典之一，也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。书中记录了 365 种药物的性能及功用，并综述了药物学的基本理论，以及药物采集时间、根茎花籽的不同用途和服用注意事项等，古今医家都对它推崇备至。不过，对于这本书的作者，历来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在这里，就将古往今来人们的不同观点简要地加以介绍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既题名神农，自然有不少人以神农为其作者。《周礼》郑康成注曰：“五药，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也；其治合之齐，则传乎神农、子仪之术。”北齐颜之推《家训》也说：“《本草》神农所述，而有豫章、朱崖、赵国、常山、奉高、真定、临淄、冯翊等郡县名，皆由后人所羈入，非本文。”也有主张是黄帝大臣岐伯作品的，《帝王世纪》中就说：“黄帝使岐伯尝味本草，定《本草经》，造医方以疗众疾。”宋代寇宗奭《本草衍义·序》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：“汉书虽言《本草》，不能断自何代所作，《淮南子》虽言神农尝百草以和药，亦无《本草》之名，惟《帝王世纪》云云，乃知《本草》之名，自黄帝始。”然而神农、黄帝之时，一无文字，二无书籍，要说此时就有了《本草经》，实在让后人难以置信。所以人们多以之为假托之辞。这正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中所说的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托于神农黄帝，而后始入说。乱世暗主，高追其所从来，因而贵之。”

神农、黄帝说以外，也有人以为《本草经》是商代伊尹的著

作。如晋皇甫谧的《甲乙经·序》中就说：“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。”不过也有人认为商周时代，药物疗法已经盛行，如果《本草经》是当时的著作，一定会在文献中有所反映，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所以说《神农本草经》不是商周时代的作品。（见陈邦贤《中国医学史》上海书店 1984 年版）

梁陶弘景的《别录序》中则说《神农本草经》“书中所出郡县，乃后汉时制，疑系仲景、元化等所记。”这种说法在陶弘景以后，也曾得到不少人的赞同，现代学者们就多以为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两汉时代人的作品。姚元翼《中国医学史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年版）中认为《神农本草经》“约成书于公元 1—2 世纪间，它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，托名‘神农’，是尊古之风的体现。”甄志亚的《中国医学史》（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4 年版）一书中认为《神农本草经》“非一时一人之手所作，而是经过秦汉以来很多医药学家的经验积累总结，并不断搜集编辑，最后约在东汉早期编辑成书”。李经纬、李志东的《中国古代医学史略》（河北科技出版社 1990 年版）赞同这一观点。史兰华等编的《中国传统医学史》（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）也认为：“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内经》一样，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，它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，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整理，直至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。”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主要论据有三：一是张仲景的《伤寒病杂论》所载的药物，大多数都是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所有的，另外还有一些则见于《名医别录》；二是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药物的产地时，有很多都是东汉时的郡县名；三是《本草经》中有许多“久服神仙不死”的记述，这很明显是受东汉以后的道教思想的影响。

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些论据入手，认为《本草经》当是西汉末年的作品。薛愚主编的《中国药学史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年版）一书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证：《本草经》中收载有胡麻、葡萄等，根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书记载，这些植物都是原产于西域，在汉

武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 138 年）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大宛带回中国的，这足以说明《神农本草经》成书在公元前 138 年之后；另外，汉代曾有几处大规模的官方校书活动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汉平帝元始元年（公元 1 年）未央宫会议之后的校书，“很可能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内容经过这次‘未央宫会议’也得到了统一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收录的药物，不像《山海经》那样，在各经中也有不少的重复，就是例证。”所以说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在公元 1 年之前已经成书。至于该书的作者，也不是神农氏，而是千千万万勤劳、智慧、勇敢的人民。同于这一说法的还有范文澜、陈邦贤、李涛等，范在其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修订本（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）第二编中说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曾记录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但西汉时确有这一部名叫《本草》的药物书，书中多见东汉时地名，当是东汉医家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。”陈邦贤《中国医学史》中也认为《本草经》为西汉时的作品。李涛《秦汉时代的医学成就》一文则根据《汉书》中的《楼护传》、《成帝纪》、《平帝纪》等的记载，认定《神农本草经》是公元前 1 世纪的产物。（见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53 年第 2 期）另外，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《中国医学史》（上海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）认为《神农本草经》是西汉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书，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，“神农”当是尊古之风的假托。

西汉末年说和东汉说各有所据，一时让人难辨真伪，所以也有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，就笼统地说，《本草经》是秦汉以后人的作品。像吉林科技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《中国医籍提要》一书中就认为《本草经》的成书年代约在秦汉时期，至于作者，此说则认为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梁启超提出来的。他在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（中华书局 1955 年版）一书中说：《神农本草经》自“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，至宋齐间，则已成立规模矣。著者之姓名虽不能确指，著者之年代，则不出东汉末迄宋齐之间。”

看来，关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问题，的确是众说纷纭，大概一时也不会有确切的答案。

《夏小正》是否为夏代成书

《夏小正》，这本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，由“经”和“传”两个部分组成。“经”是正文，“传”是注解。《夏小正》经文全篇共四百余字，按十二个月份排列，记载着每个月份的物候、气象、天文，以及各个月份应该进行的生产事项，如渔猎、农耕、蚕桑、制衣、养马等。由此看来，它是一个统治集团关于生产活动的安排日程表和经验总结。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？

《夏小正》采用夏代的历法记事，《今本竹书纪年》中又有夏禹元年“颁夏时于邦国”一语，历来便有不少人认为，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记，是夏代的文献。但是根据考古学的材料，夏代从时间上推算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，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仅有很简单的符号字。夏代便不可能用文字对天文、气象、物候作如此系统的记录。

《古本竹书记》称夏禹“居阳城”，阳城在今河南西部的登封县内。近来考古学家也认为，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。有人据此主张，《夏小正》是西周、春秋时代居于原来夏代领域、沿用夏代历法者所作，它很可能是晋国的文献。《左传》记晋国史实多用夏历，这是明证。但《夏小正》中所记的事物都在淮海地区，如说“雀入于海为蛤”，“玄雉入于淮为蜃”。他们如果看不见淮河和海，便不会如此记载的。再如，正月经文中记有梅、杏、桃等花开，这在黄河流域的晋国也是不可能的。二月的经文里还有“剥鲋”一条。这个“鲋”就是如今的扬子鳄，它活动在长江中下游，晋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。据此看来，《夏小正》便不可能是晋国的文献。

夏朝灭亡后，夏王的子孙被封在杞国（今河南省杞县）。《礼

记·礼运篇》载，孔子曾经想考察夏代的政治情况，因而到杞国去，但夏代的文献已大多散失，他只是“得夏时”罢了。这里所谓的“夏时”，大概就是《夏小正》一书。司马迁在写《史记·夏本纪》时又说：“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传《夏小正》。”根据以上资料，有人认为《夏小正》是杞国的职官书，而经过孔子审定的。

杞国的历史很长，它曾经是殷王朝的诸侯国，后来又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。它的国土原在淮海地区，到春秋鲁僖公时期，杞国受到淮夷的侵犯而内迁了。如果《夏小正》是杞国的文献，那末它一定是在内迁之前早就写成。而且，《夏小正》文句简奥，大多数是二字、三字或四字就成一完整句子；还有《夏小正》经文中用的一些假借字，春秋以后很少用了。由此推定，它的成书年代必在春秋早期以前。

有人认为它是西汉时代所编写的，因为《夏小正》最初出现在西汉戴德编纂的《大戴礼记》中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把《夏小正》定为“戴德撰”。这当然是不足信的。《大戴礼记》一书固然收入了西汉时人的一些著作，但在西汉，经过秦“焚书”之后，一些埋藏的古籍正在陆续发现，不能排除《大戴礼记》也搜集了一些较古的文献的可能。

有的天文学家根据星象移动的规律，测出《夏小正》所言的天体现象，恰和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年的现象相合。于是认为，这本书的编纂当在西周初年。有人推测，商代后期才有大量的甲骨文出现；《尚书·多士》篇说：“唯殷先人有册有典。”那么这本书的撰写可能在商代后期或商末周初，是当时居住在淮海地区，沿用夏代历法的杞国人整理记录而成的。《夏小正》经文中有两处出现“王”字，一说“王褒”，二说“王狩”。有人指出，在西周铜器散盘氏铭文中，“矢”作为宗周五畿附近的一个小国，它还公然称“王”，那么杞国就更能称王了。

不过，《夏小正》的历法十分简单、它只是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，没有置闰月的方法，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；它所记载

的自然界现象，以动植物的变化最多，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；它所记的生产活动，也只是农业、畜牧业、渔猎、采集，而还没有提到“百工”之事，手工业生产在当时还很不发达。许多迹象表明，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于生产活动的世代经验的积累。况且，据《古本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夏桀后来“出奔南巢氏”，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。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，应该也在淮海地区。故此，可以推断，《夏小正》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。

究竟《夏小正》是什么时代的作品，这需从历史学、文字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，方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。但目前，这个问题仍是一个谜。

《易经》何时何人所作

《易经》是儒家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之一，也是中国古代一部最具传奇色彩的“玄而又玄”的作品。《四库全书·易类小序》中说：“《易》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，以逮方外之炉火，皆可援《易》以为说，而好异者又援以入《易》，故《易》说愈繁。”两千余年来，有关《易经》的研究从未中断，可直至现代，人们仍以《易经》为一部奇书、“天书”。不但《易经》中所及的象数、义理没有人能予以真正客观和服众的阐释，就连《易经》一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，都没能取得一个统一的认识。这里将对学术界关于《易经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不同认识作一概括的介绍。

《易经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名为两个问题，实则紧密相关：弄清楚《易经》的作者，其时代之谜自然也就迎刃而解；同样，弄清楚《易经》的时代，也有助于进一步确定其作者。所以，在这里，我们就将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，一起介绍。

众所周知，《易经》的内容主要指六十四卦的卦象、卦辞、爻

辞等。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云：“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。”而到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进一步提出了“人更三圣说”，即伏羲氏画八卦，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，并作卦辞和爻辞，而孔子作传以解经。对伏羲作卦象之说，后人多持肯定态度，而对于文王作卦辞爻辞，后人则多有异论。《周易正义·序》中就曾列举了两种说法：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，二说卦辞文王作，爻辞周公作。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更以为卦辞爻辞都是孔子所作。今人对这个问题亦不乏探索者。林炯阳《周易卦辞爻辞之作者》（见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《易经研究论集》）中认为：卦辞作于文王，似属可信，爻辞作于周公，亦不无道理，卦爻辞并是文王或周公所作之说不可遽信，卦爻辞并是孔子所作尚欠周延。若依此说，则《易经》多半作于西周初叶。

《易经》作于西周初叶的说法在学术界曾得到很多人赞同，不过他们对于文王或周公作卦爻辞的说法却多有异议。像靳德峻《本田成之君〈作易年代考〉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》（1940年2月上海《新东方》第1卷第2期）中认为《易经》的制作时代是西周初年以前，而制作者为周民族。这里的“周民族”稍嫌宽泛，也有说得比较具体的，如顾颉刚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中说：“它（《易经》）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初叶。著作人无考，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。”（载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）余永梁的《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》中说：“卦爻辞不是周公作，倒是卜巫之官作的，它的时代是周初。”（载1928年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卷第1期）詹秀惠《周易卦爻辞之著成年代》（载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《易经研究论集》）也认为卦爻辞非文王、周公、孔子所作，也非成书于春秋末期，而是著成于西周初叶，出于一手之创作，作者可能是太卜之流。而王开府《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》（同前《易经研究论集》）则从卦爻辞中所见的风俗制度以及当时所知之史事推断出：“卦爻辞为周初卜官所作，其作者非一人，间或杂入商人之辞。初时亦无定本，故
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繇辞亦有异于《周易》者。唯春秋时占筮者多本之《周易》，则卦爻辞之编定集为定本，当在春秋前。”

和“西周初叶说”并行的一种说法是“战国初期说”。这种说法的一个极力的提倡者是郭沫若。郭沫若在其《周易之制作时代》中认为：《周易》非文王所作，与孔子也无关系，根据汲冢所出的《周易》和《易繇阴阳卦》，《周易》的制成时代当在战国初年，作者为孔子的再传弟子楚人馯臂子弓。（见《郭沫若全集·历史编》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）《易经》的作者是楚人的看法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也曾在其《作易年代考》（见《先秦经籍考》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）中作出类似的推测：“易多记南方动物，故余以《易》为楚人之编纂物，颇有理由。”不过他认为《易经》的产生当在战国末期，所以这个楚人，自然也就不是馯臂子弓了。再后来，一篇署名为平心的文章《关于周易的性质、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》又作出了如下的推断：“郭沫若先生认为《周易》作于战国时代的推断是很难动摇的。”而“认为《易传》是孔门弟子所撰，其中体现了孔子思想的论断是很难成立的。”（《学术月刊》1963年第7期）

关于《周易》的著作年代和作者，李镜池也曾著专文进行论述。他的《周易通义》和《论周易的著作年代——答郭沫若同志》（《华南师院学报》1982年第4期）从政治社会背景、思想发展和文学形式等方面分析，最后得出结论：《周易》当作于西周后期，至于《易经》的作者，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。王世舜、韩慕君《试论周易产生的年代》的看法与之类似，他们通过对上古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考证，证明西周时尚未产生筮占，自然不可能产生《周易》，“《周易》是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以前的产物。”（《齐鲁学刊》1981年第2期）

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求稳妥的说法，它只界定了《周易》产生的下限。李汉三《周易卦爻辞时代考》：“卦爻辞之产生至迟亦决不至迟至春秋中叶以后。”（载台湾1966年5月《大陆杂志》32卷

10期)蒙传铭《周易成书年代考》则通过考察先秦古籍引《易》的情况得出结论:“《周易》经文之编纂成书,远在鲁庄公二十二年(公元前672年)之前。”从时间上看,他们的观点倒也比较一致。

以上各种观点多是学者们依据《易经》内容,着眼于历史学或考古学的方面展开的论证。而在《周易》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学者们从另外一些学科的角度入手,探讨了《易经》的成书年代。如高文策《试论易的成书年代与发源地域》一文就从天文学史的角度,推断“《易》成书于殷末安阳地区,乃无容轩疑之事实”。(《光明日报》1961年6月2日)而陆侃如《论卦爻辞的年代》则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,得出了一个比较笼统的结论:“《易》卦爻辞的写定约当西周中年。”(1932年《清华周刊》37卷9期)他们的结论是否正确,还有待于专家们的考证,但这种从不同角度入手,尽量拓宽研究层面的做法,对我们尽快地解决问题,无疑是有好处的。

关于《易经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说法有很多,限于篇幅,这里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。但管中窥豹,可见一斑,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中,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古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分歧所在,而本文的目的也即在于此。

《穆天子传》真伪之辨

西晋初年,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了竹书《周易》、《纪年》、《琐语》和《周王游行》等,后来《周王游行》经过今文的改写,易名为《穆天子传》。全书六卷,主要写周穆王“盗骊、骅耳之乘,造父为御,以观四荒,北绝流沙,西登昆仑,见西王母”(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·子部》引《左传》语)之事。这部作品描绘了西周时西北各个邦国的民俗风情,保存了古代东西方民族友好交往的史料,所以一经发现,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。然而,因为其中也包含大量的神话因素,所以时至今日,关于《穆天子传》仍有

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：如《穆天子传》的性质类别问题、成书年代问题等。这些问题都使得《穆天子传》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。

关于《穆天子传》的性质类别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是“周时内史所记，王命之副”，所以归之于“史部·起居类”。这种说法影响较大，以后的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等都从此说，认为《穆天子传》当属“史书”。然而到了明代，胡应麟一改前说，认为《穆天子传》“颇为小说滥觞”（《少石山房笔丛·三坟补逸下》），后来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说《穆天子传》“如后世小说野乘之类”，并把它归入“小说”类，所以这种观点便一下子被大多数的学者所认定。步入现代，学者们对于《穆天子传》的性质又有了不同的认识。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三（中华书局1958年版）说“柳子厚游山记法《穆天子传》”；王贞珉的《〈穆天子传〉简论》（《文史哲》1962年第五期）和茅盾的《神话研究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）则把它归入“神话”一类；而张公量《穆天子传合证》（见《禹贡》第一卷第五期）则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是一部“地理著作”。1992年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杰文的《穆天子传通解》一书，书中通过详尽的论证，认为《穆天子传》的素材“有取自历史性的‘文字提示材料’，有取自非历史性的‘口头传播材料’和民间传说、民间神话，可谓真伪参半，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互见”，而它“所写的故事与穆王时期的历史真相相去太远”，所以最终把《穆天子传》归于“小说”一类。

《穆天子传》的成书年代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。主要的观点有四：其一为“西周史官所记说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首倡其说，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三四中亦持此说。到近人，释持的《穆天子传书后》（见1922年《亚洲学术杂志》第3期）、刘师培的《穆天子传补释》（见《国粹学报》第五卷第1期）等也力

主此说。其二是“春秋战国成书说”。这种观点在现代影响较大，最早是清人王漠在《穆天子传跋》中提出，卫聚贤《穆天子传研究》、顾颉刚《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》（见《文史哲》第一卷第2期）、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（1955年修订本）等都沿用此说。郑文杰的《穆天子传通解》一书也从“战国人的观念”、“战国时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情况”、“战国人用词、作诗的习惯”等三个方面，推断出《穆天子传》应当产生在战国前期。而王贻樑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·整理前言》（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）中则从“七萃”、“珠带贝饰”、“黄金之罍”、“皇后”等词语以及“博”这种技艺入手，提出了一些成书战国说的新证。其三“是秦汉成书说”。著名学者杨宪益力主此说，他在《〈穆天子传〉的作成年代及其作者》一文中从汲冢被盗的时间、汲冢墓主、汲冢简书字体、简策的尺寸等方面入手考证，最后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是秦汉间的伪书。（见《译余偶拾》三联书店，1983年版）其四“是晋人伪造说”。宋人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和清人姚际恒的《古今伪书考》都持此观点，今人童书业的《穆天子传献疑》（见《禹贡》第5卷第三、四合期）中也从“西王母人化”、“膜拜礼晚出”、“皇后之名可疑”、“体例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——称天子不称王”四个方面来证明《穆天子传》为晋宋间的伪书。

对《穆天子传》的研究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先秦历史的资料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风俗人情和社会面貌。虽然关于《穆天子传》的这种种问题，到现在仍然莫衷一是，但相信经过科研工作者的努力，谜底终究会大白于天下。

《黄帝内经》成书年代之争

作为中国古代成书最早、影响最深远的一部中医宝典，《黄帝内经》一向为中医研究者所瞩目。这部书以其丰富的内容，总结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体科学的认识，也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，

可以说，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的渊藪就在这里，两千年来的医家学者无不从中受益。正因为这一点，这部书被尊称为“经”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时至今日，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仍然未能确定。

从《黄帝内经》的名字及其内容中黄帝和岐伯等的对话来看，这部书和黄帝有一定的关系。晋代的皇甫谧在其《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》序中曾说：“黄帝咨访岐伯、伯高、少俞之徒，内考五脏六腑，外综经络血气色候，参之天地，验之人物，本性命，穷神极变，而针道生焉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二一引《帝王世纪》语说：“岐伯，黄帝臣也，帝使岐伯尝味草木，典主医病经方，《本草》、《素问》之书咸出焉。”然而自宋及清，程颢、司马光、朱熹、方孝孺、魏荔彤、崔述等都对之提出了怀疑。的确，从今人推想，黄帝时期生产力水平落后，科学技术也不发达，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《黄帝内经》这样的高水平的理论著作的。其书之所以托名黄帝，无非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所说的那样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因此，许多人都认为黄帝之说不可信。古人对于《黄帝内经》的成书年代问题，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：

（一）成书于先秦、战国之时。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有宋代的邵雍、明代桑悦、方以智、清代魏荔彤等。邵雍在《皇极经世》卷八《心学第十二》中以为《素问》是“七国时书也”，桑悦在《素问钞·序》中认为“《素问》乃先秦战国之书”，方以智《通雅》中说：“谓守其业而浸广之，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也，皆周末笔。”魏荔彤《伤寒论本义·自序》则云：“轩岐之书，类春秋、战国所而为托于上古。”

（二）成书于战国、秦汉之间。宋代的程颢主张“《素问》书，出战国之末，气象可见。若是三皇五帝典坟，文章自别，其气运处，绝浅近”。（《二程全书·伊川先生语》）司马光《传家集·与范累仁第四书》也说：“谓《素问》为真黄帝之书，则恐未可。黄帝亦治天下，岂可终日坐明堂，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邪？此周、汉

之间，医者依托以取重耳。”到清代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。书中说《素问》“出上古，固未必然，然亦必周秦间人，传述旧闻，著之竹帛。”因为《四库全书》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，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。

（三）成书于西汉时期。明代朗瑛所著的《七修类稿》认为《素问》“首篇曰上古、中古，而曰今世，则黄帝时果末世邪？又曰以酒为浆，以妄为常，则仪狄是生其前而彼时人已皆伪邪？《脉要精微论》中罗裹雄黄，《禁服篇》中歃血而受，则罗与歃血皆当时事邪？予故以为岐黄问答，而淮南文成之者耳。”在这里，朗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“罗”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《素问》产生于西汉时期。

对于《黄帝内经》成书年代，古人的看法主要就有这些。然而研究并没有到此结束，当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少。象龙伯坚的《黄帝内经概论》、任应秋和刘长林的《〈内经〉研究论丛》、刘长林的《〈内经〉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》、傅维康和吴鸿洲的《〈黄帝内经〉导读》等专著，都涉及了这个问题。在这里，主要就任应秋、刘长林和傅维康、吴鸿洲的观点进行简单的介绍。

任应秋、吴鸿洲的《〈内经〉研究论丛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）中把《素问》的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进行考察。第一部分主要指七篇大论以外的内容。作者通过对《内经》和《周礼》及《史记·扁鹊仓公传》的对比，说明三者学术思想上的一致性，并通过对《素问》文字结构的分析，说明这一部分出自于先秦而不可能迟于扁鹊。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指七篇大论。作者通过分析前人的成说和大论的内容，认定这一部分内容出自于战国至东汉之间，而且经过多数医家汇集而成。至于《灵枢》，作者先通过对其书的真伪的分析，判定《灵枢》与《针经》实即一书，而后又得出结论，“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一样，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，只是个别的篇卷，掺入了汉代的東西，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